

核心提示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就生态文明建设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加快推进建设美丽湖南，就应当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不断深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牢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嘱托，筑牢美丽湖南建设的生态安全根基，坚决扛牢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政治责任，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毛明芳

省委十二届五次全会强调，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推动绿色低碳转型。近年来，湖南生态环境得到全局性改善。147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98.6%、居中部第一，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91%，森林覆盖率、湿地保护率分别达59.98%、70.54%；近5年单位GDP、规工业增加值能耗分别下降17.2%、27.2%，绿色发展指数进入全国前十。尽管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生态环保历史欠账较多、新增问题没有禁绝等问题依然突出。学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实现2035年基本建成美丽湖南的目标，必须牢牢守住底线、红线，坚持系统思维，增强风险意识，不断健全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体系，把筑牢生态安全根基这项基础性工作做好。

健全体制机制，牢牢守住生态保护红线

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

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大制度创新。2022年，我省已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418.89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20%，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2023年7月，我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并印发《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为全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督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但当前依然存在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不清晰、常态化监管需加强、长期保护动力不足等问题，要通过建立健全机制来守牢生态保护红线。

定期开展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评估。应以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为基础，围绕生态系统构成、结构、质量、功能和风险等指标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监测指标体系。建设和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监测网络体系，加强监测数据集成分析和综合应用，全面掌握生态保护红线构成、分布及变化趋势。开展包括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评估、生态风险预警等内容的保护成效评估，并将保护成效评估结果作为政府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依据。

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常态化监管执法机制。建立全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和监管数据库，有序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破坏问题的常态化监督，逐步实现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的日常化、智能化、科学化。定期开展生态保护红线执法督查，切实做到有案必查、违法必究，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的震慑力。

健全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英国以《英国环境法》为基础，扩充生态补偿的范围，将保留在英国北部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定义为生态服务，纳入生态补偿范畴，要求在农场经营中优先考虑对生态特色的保护，对传统农业耕作方式予以保护。建设美丽湖南的过程中可适当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充分考量生态保护红线区群众

的发展权益，整合各类生态保护与建设资金，加大对生态保护红线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加大对生态保护红线覆盖面积较大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探索建立生态保护红线所在地区和受益地区的横向补偿机制。

以问题为导向，系统谋划推进生态修复治理

生态修复治理是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维护国家与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途径。按照省委全会提出的“持续推进生态修复”要求，应当以当前依然存在的重点湖泊生态系统退化、生态修复治理科技支撑不足、尾矿库治理遗留问题等多生态问题为导向，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进行修复治理。

持续推动“一江一湖三四水”系统联治。我省已形成以长江岸线湖南段为纽带，以洞庭湖为中心，以“武陵—雪峰、南岭、罗霄—幕阜山脉”为自然屏障，以“湘资沅澧”为脉络的“一江一湖三四水”生态安全格局。应严格遵循生态系统生命共同体理念，以“一江一湖三四水”为主战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全要素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做到算大账、长远账、整体账，努力实现生态修复治理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强化生态修复治理的科技支撑。围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治理的全生命周期开展科技赋能行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先进科技手段，构建生态修复治理科技集成体系，形成监测预警——量化评估——实验示范——动态监管的全流程科技支撑模式，以科技手段提升生态修复治理的实际效果。

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严格执行《湖南省深入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实施方案》，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坚持问题导向推动生态环境治理，以“壮

士断腕”的决心打造“最美长江岸线”，着力提升长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健全耕地草原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合理实施休耕、禁养、禁渔、禁采、禁伐。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在重金属污染区和生态脆弱地区，通过扩大轮作休耕试点提高耕地质量。落实长江十年禁渔计划，促进水生生物资源逐步恢复。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进设立南山国家公园，对洞庭湖、张家界重要生态系统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本底进行充分调查和论证，开展建设国家公园的可行性研究。

坚持底线思维，严密防控生态环境风险

生态环境风险是未来可能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影响后果，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当前全省生态环境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但一些污染风险源依然存在，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风险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需采取有效措施防控生态环境风险。

强化生态环境风险意识。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高度警惕和防范生态环境领域的各种风险隐患，把严密防控生态环境风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以万分努力防止“失之万一”，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生态安全权益。

严密排查生态环境风险隐患。强化“一库一品一重”等重点领域生态环境隐患排查和风险评估，编制生态环境风险隐患清单并定期更新。突出保障群众饮水和水环境安全、突出环境问题整改落实、工业企业环保监管到位、“邻避”问题及时有效化解等重点目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

转变生态环境风险防控模式。积极推动生态环境风险治理模式从事后补救向事中控制、事前预防转型，做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将生态环境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防止各类风险积聚扩散，降低风险损失。把生态环境风险防控纳入常态化管理，系统构建全过程、多层次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多管齐下，健全生态环境应急管理体系

加强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减少突发生态环境事件数量，控制事件影响，是降低生态风险、维护生态安全的必然要求。

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建设省、市、县（区）、乡（镇）四级生态环境应急队伍，并建设应急实训基地，加大培训力度，全面提升生态环境应急队伍应急处置和协同配合能力。建立涵盖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应急、水利、气象等多个领域的生态环境应急专家库，充分发挥高校、院所和其他社会组织专家智囊作用，着力打造多元协同参与的生态环境应急技术支撑队伍。

健全应急管理体系。健全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准备责任体系及应急响应和处置机制，提升事中妥善处置能力，提高应急响应处置规范化水平。尤其应加强跨部门、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建设，严防生态环境风险事件蔓延扩大，防控次生事件风险。还有必要健全事后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和赔偿、生态环境修复、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等制度。

强化应急保障工作。督促企业等市场主体制定突发生态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做到有备无患。推进“政府+企业+市场”生态环境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建设区域性生态环境应急物资储备库，构建“节点式”“网络化”储备体系。加强生态环境突发应急技术储备，鼓励先进适用技术研发推广，提升应急保障的科技水平。健全生态环境应急指挥和响应平台，提高预警调度能力。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科技与生态文明建设部副主任、教授，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特约研究员】

唐瑞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网络强国战略，把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健全法治政府建设科技保障体系，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贯穿数字政府运行全过程，对行政决策机制、行政执行机制、行政监督机制等进行升级改造，以数据流整合决策流、业务流、监督流，才能不断推进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完善科学规范的决策机制。大数据技术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充足的依据和先进的技术，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但同时，数字决策不能偏离法治轨道，在数字化这个新的领域，只有不断提升法治化，才能确保其健康、安全、有序发展。

提升数字决策合法性。我国《数据安全法》明文规定，国家机关收集使用数据应当依照法定的职责范围、条件、程序进行，特别对相对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决策和负担行政行为，应当遵循重大事项“法律保留”的有关规定，不能完全依赖数字技术行使行政决策权。优化政府大数据决策，其基础是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行使法定权力，履行法定职责，严格遵循“于法有据”“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规则，着力明确政府决策的主体、职能、事项、程序与条件，确保数字决策始终运行于法治轨道上。

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统筹建设人口、法人、宏观经济、自然资源与空间地理等基础数据库，拓展完善应用驱动的主题数据库、特色数据库，广泛收集决策数据样本，为数字政府决策提供充足全面的基础资料。建立标准统一、动态管理的政务数据目录，实行“一数一源一标准”，对相关数据进行甄别清洗。当前，我省要克服公共数据融通共享水平不高的问题，打造大数据总枢纽，归集数字政府项目前置审查，推动跨区域、跨行业、跨部门数据共享联动，努力破解“数据孤岛”“数据梗阻”困局，提升数字政府决策的整体效能。

深化数字决策机制改革。强化数字政府建设与机构改革、行政组织制度、行政程序等协调配套，建立健全决策制度、决策流程、决策事项、法律责任等管理。健全大数据辅助决策机制，加强语义理解、语音识别、算法模型等辅助决策技术应用，提升对大数据的综合处理能力。构建“决策—执行—评估—改进”闭环，强化大数据决策的规范化评估，推动构建成熟的数字决策模型体系，提升大数据决策的可预测性、可控性。

健全高效精准的执行机制。数字政府通过广泛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标准化技术，可以充分实现行政执行的高效、精准、公正。

夯实数字政府“底座”。当前，我省数字政府“底座”建设相对滞后，要以电子政务内、外网建设为牵引，优化“湘易办”超级服务端，大幅精简政务APP，吸收整合各类数字政务平台、功能，建强数字政府“数据中枢”“智慧大脑”，打造功能聚合、协同高效、生态完善的一体化数字政务平台。

优化公共服务模式。以“打造泛在可及、智慧便

建设数字法治政府 需强化数字治理赋能增效

捷、公平普惠的数字化服务体系”为目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用数字化理念、技术和手段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到我省，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扩大“一网通办”“掌上办”的事项范围，拓展“一网统管”“一网协同”“接诉即办”等功能，努力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多级联动数字政务服务体系，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法治理念、思维、制度渗透扩展到数字政府全过程，对数字政府的核心业务和重要环节进行法治化重塑。切实深化“放管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利用数字化手段规范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推行“清单之外无权力、平台之外无审批”，推进简政放权。建立与业务职能相对应的数据体系，实现重点领域和高风险事项全面映射，实行项目化管理、标准化发布、动态化运行，打造透明、公平、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推动数字政府由管理向服务转变，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企业和群众需求进行“画像”，对公共风险进行准确预判，满足个性化、定制化服务需求，提高精准性和针对性。

强化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政府权力与数字技术融合，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效应，需要运用数字思维与法治思维提升数字政府综合治理效能。

构建多元参与机制。强化综合治理、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推动从单一治理模式向多元协同共治转变，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监督、全民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格局。完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的“技术性正当程序”，强化数字政务原理公开、充分告知、全程参与等制度设计，充分保障相对人及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动数据成果共享与合作治理，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数字政府运行过程，调动数字技术支撑者的积极性，拓展政府、市场、社会协同联动的广度和深度。

创新数字监督方式。强化对行政相对人数据赋权，丰富数据财产权、共享权、发展权、自决权等个人数据权利谱系，缓冲“数字技术+权力”的支配与控制，缓解社会对政府滥用数字技术的担忧。强化政府信息公开，扎实推进大数据监督试点推广。我省可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为基础，统筹整合领导留言板、问政评价、举报投诉、问卷调查等各类社情民意数据，运用算法技术及实时梳理确定“好评”榜单，充分凭借“数”来监督，“让数据站岗、让数据说话、让数据问责”，持续提升监督实效。

推动技术向善向上。数字政府依赖大量的算法、人工智能等技术，要深化法治价值嵌入，将伦理规则与法治原理写入具体数字应用与政务算法，并贯穿数字政务运行全过程，推动数字技术彰显人文精神。营造可信的技术环境，建设统一的政务区块链底层设施环境，发挥可溯源、防篡改等特性，为数字政府运行提供可信、可控的技术支撑。加大对政务数字技术的管理，完善可解释、验证、备案、审计等制度，健全技术失控的责任追究，倒逼政府更好约束管控数字应用与政务算法，改善政务算法价值立场、服务质量、服务效率，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作者系湖南省网络空间研究院研究人员、法学博士）

阅见

以环境邻避风险治理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廖小平

邻避设施，顾名思义就是“邻居希望躲避”的设施，是一些可能会对所在地居民生活环境、生命健康、经济财产等造成不良影响，容易招致居民反对和抵制。设施。然而，垃圾转运站、加油站等邻避设施也是公共设施，是公众享有安全、便利和多样化生活的重要保障。日前，邓集文教授撰写的《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的包容性治理研究》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针对城市环境邻避风险的包容性治理这一城市治理的重点难点，该书从治理缘起、现有模式、模式转换、实现条件、经验借鉴、实现路径等方面对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的包容性治理进行全面系统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对于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该书选题切中城市治理要害，具有现实针对性。近年来，因垃圾焚烧场、污水处理厂等环保设施建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一边是严峻的形势亟待新建各项公共设施；一边是公众质疑、邻避效应，尤其部分环保设施遭遇需求之切和落地之难的尴尬。该书系统研究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的包容性治理，旨在找出问题症结、破解这一尴尬，从而实现邻避设施建设管理有序、高效，实现最大范围的服务、最低成本



邓集文著《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的包容性治理研究》

的运营。创新提出解决方案，举措切实可行。该书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法和定量测量法进行问题研究，让验证充分有力。运用定量测量法得出样本条件变量的年均值、总体

均值，据此评估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治理的包容性程度，这体现研究方式的创新。由此，富有创新地提出包容性治理是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治理模式转换的路向选择，提出社会权能的渐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是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包容性治理的实现条件。恐惧来源未知，如果对于“为什么要建，存在哪些风险，有何防范机制”语焉不详，就很容易放大周边居民的心理恐慌，产生本能的抵触和排斥。针对公众心态，该书提出建立政府、科学专家与公众之间的互信，并建议政府对公众的态度和行为给予理解，对相关影响进行科普。该书在剖析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城市环境邻避风险包容性治理的实现路径，为治理实践提供参考，这对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书基于风险政治学、公益政治学、环境政治学、政治社会学、传播政治学和风险管理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视域展开多维透视。以风险政治学为视阈，创新了环境邻避的研究视角；以风险政治学话语为载体，更新了环境邻避的研究术语；以环境邻避风险的包容性治理为内容，拓展了环境邻避的研究深度。这些为环境邻避风险研究的知识谱系勾勒了新的图景，丰富了环境政治学和风险治理理论。

（作者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

用红色电影讲好中国故事

赵文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电影是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重要载体，优秀的电影艺术作为上层建筑，能更好地服务经济基础。电影艺术，尤其是红色电影，能够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主旋律，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近几年来，红色电影的票房不断攀升，电影内容越来越受到大众喜爱，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受到优秀精神力量的熏陶，产生共鸣，形成价值认同。因此，在红色电影中讲好中国故事能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示中国故事背后的精神力量，能更好地激励人。

加强政治引领，坚守精神力量。在数字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文化领域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外来文化侵蚀无处不在，社会意识形态也受到冲击。在思想大杂烩中找到正确方向，就必须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就必须接受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熏陶。作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色电影是时代的记忆，诠释着时代精神。它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还原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见证时代变迁，歌颂革命英雄英勇无畏、誓死不屈精神，表现普通人民的斗争精神，唤起人们对革命岁月的追忆，让一代代人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历史使命感。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制

作的电影《上甘岭》，热情讴歌了志愿军战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硬是凭着“气多钢少”战胜了不可一世的“钢多气少”的敌人，该片插曲《我的祖国》更是成为激活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密码；再比如，虽然通过历史教科书人们已经熟知中共一大从上海转到嘉兴南湖的惊险过程，但电影《1921》通过展示真实的历史背景，让每一位观影者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触。特别是南湖船上传出的那声巨响压低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欢呼声，让人顿感心潮澎湃。新征程上，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加强政治引领，立足本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厚植红色底色，坚定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基因，是我们国家和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红色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相互契合，是最厚重的软实力，是文化自信的源泉。电影《建党大业》《建国大业》里的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传递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就是秉持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九州共贯、多元一体、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等理念，团结带领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光辉历程。红色文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时代活力，红色成为最鲜亮的时代底色，

为文化自信增添了深厚底蕴。新征程上，我们必须把牢党对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通过光影艺术，以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正”，创造出内容形式的“新”，把文化自信融入人民群众的精气神与文化生活品格中。

依托科技赋能，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坚持人民至上是艺术的根本遵循。“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可以引发无数人的共鸣。电影作品要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更加贴近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贴近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同时，电影艺术是一门十分依靠科技进步的艺术，它顺技术进步而生，因技术进步而兴。进入2012年，中国红色电影迎来了一个新纪元。从2014年《智取威虎山》开始到2022年《水门桥》，近几年一部一部红色电影突破几十亿元票房已经屡见不鲜，证明了受众对于红色影片十分喜爱。新时代，电影艺术应该更多借助3D、4K等技术手段使场景更丰富，观感更震撼，切实增强故事的感染力和传播力。

（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